

劉師培文學史觀念的轉變： 由「建安文學，革易前型」切入

樊善標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講義》與〈風度〉的分野

魯迅不直劉師培為人，也不以他保存「國粹」為然，¹但私下及公開提到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下稱《講義》），都有極高評價，尤其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下稱〈風度〉）一文稱述最詳。²魯迅在此文中把《講義》和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晉南北朝文》、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放在一起介紹，前二者是作品總集，《講義》則「輯錄關於這時代的文學評論」。驟看一律視為資料集，但魯迅接着把漢末魏初的文章風格歸納為清峻、通脫、華麗、壯大，這是全文第一個重要論點，基本上承用了《講義》第三課「論漢魏之際文學變遷」總述裏的用語，只把「華靡」、「騁詞」改為「華麗」、「壯大」。魯迅又從「華麗」引伸出「文學的自覺時代」之說，

¹ 魯迅說：「中國國粹、雖然等於放屁、而一群壞種、要刊叢編、卻也毫不足怪。該壞種等、不過還想吃人、而竟奉賣過人肉的偵心探龍做祭酒、大有自覺之意。」見魯迅：〈致錢玄同〉（1918年7月5日），載《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11卷，頁351。據《魯迅全集》注釋，「刊叢編」一事「疑指當時劉師培等計劃復刊《國粹學報》和《國粹彙編》」。又，劉師培「一九〇九年為清朝兩江總督端方收買，出賣革命黨人，辛亥革命後又投靠袁世凱，與楊度、孫毓筠等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稱帝效勞。他早年研究六朝文學，因南朝梁文藝理論家劉勰著有《文心雕龍》一書，故魯迅用『偵心探龍』代指劉師培」（頁352）。魯迅〈隨感錄三十五〉也批評「保存國粹」，見《魯迅全集》，第1卷，頁305-6；原刊於《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8年11月15日）。

² 〈風度〉說：「我今天所講，倘若劉先生的書裏已詳的，我就略一點；反之，劉先生所略的，我就較詳一點。」〈風度〉原為1927年在廣州的演講詞。〈致臺靜農〉（1928年2月24日）又說：「中國文學史略，大概未必編的了，也說不出大綱來。我看過已刊的書，無一冊好。只有劉申叔〔師培〕的《中古文學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錯字多。」兩文見《魯迅全集》，第11卷，頁609；第3卷，頁502。

認為略似「為藝術而藝術 (Art for Art's Sake) 的一派」。³ 這些說法後來成為了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常識或起點，追根溯源，劉師培的《講義》自然必須提上一筆。⁴

由於劉氏品德有疵，他的等身著作在很長時間裏為學術界所忽視。《講義》所以著名，顯然多得魯迅的稱許；而後人對「建安文學，革易前型」，也多是通過魯迅來理解。從〈風度〉提出的四點風格特徵，既可看出魯迅對《講義》的細緻體會，同時也表現了兩者文學史觀念的差異。《講義》的相關原文如下：

建安文學，革易前型，遷蛻之由，可得而說：兩漢之世，戶習七經，雖及子家，必緣經術。魏武治國，頗雜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一也。建武以還，士民秉禮，迨及建安，漸尚通悅。悅則侈陳哀樂，通則漸藻玄思，二也。獻帝之初，諸方棋峙，乘時之士，頗慕縱橫，騁詞之風，肇端於此，三也。又漢之靈帝，頗好俳詞（見〈楊賜、蔡邕傳〉），下習其風，益尚華靡，雖迄魏初，其風未革，四也。⁵

四點特徵都源自文學以外的因素，如政治人物提倡、一般社會風氣，明顯地站在他律論的立場。⁶ 〈風度〉也是如此。魯迅說：「董卓之後，曹操專權。在他的統治之下，第一個特色便是尚刑名。……影響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風格。——就是文章要簡約嚴明的意思。」引文略去了說明曹操為何尚刑名的幾句，餘下的幾乎就是劉師培原話的語譯，另加上「清峻」一詞的白話解釋。至於「通悅」，魯迅說是「隨便之

³ 《魯迅全集》，第3卷，頁502，504。

⁴ 學術界對「文學的自覺時代」說的推展和反思，可參耿祥偉：〈中古文學自覺〉，載王國健（主編）：《世紀之交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問題聚焦》（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52-103。王風認為：「魯迅以曹丕時代為『文學的自覺時代』應該就是來自劉師培的『建安文學，革易前型』，這一觀念也由於魯迅的重新表述成為當今中國文學史觀的一部分，建安朝也被普遍用作上古文學與中古文學的分界點。似乎這也就是劉師培浩繁文學論述中唯一被繼承的遺產。」見王風：〈劉師培文學觀的學術資源與論爭背景〉，載夏曉虹等：《文學語言與文章體式：從晚清到五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261-62。值得一提的是，孫明君發現日本漢學家鈴木虎雄才是最早提出「文學的自覺時代」者，見孫明君：《三曹與中國詩史》（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頁113-14。然而戴燕卻認為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說治化之文和詞章之文從漢代以後開始分化，「跟後來文學史家津津樂道的魏晉為文學自覺時代的結論，就及〔極〕其相似」。見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75。

⁵ 《講義》版本很多，本文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複印的《劉申叔遺書》（下稱《遺書》）本，引文見頁2366，標點為筆者所加。

⁶ 自律論和他律論是文學史研究的兩種模式，自律論認為文學演變的動力來自本身，他律論則認為文學演變由文學以外的因素決定。參陶東風：《文學史哲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47。

意」，源於漢末清流「講『清』講得太過，便成固執」，「個人這樣鬧鬧脾氣還不要緊，若治國平天下也這樣鬧起執拗的脾氣來，那還成甚麼話？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來反對這種習氣」，「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多量想說甚麼便說甚麼的文章」，⁷可見起因也在文學之外。

「華靡」在《講義》裏原指東漢靈帝時，鴻都門學寫作辭賦的影響，發生於建安之前。⁸〈風度〉則認為曹丕首倡「華麗」之風，以此區分操、丕時代的文學特色：曹操時是「清峻」、「通悅」，曹丕時加上了「華麗」、「壯大」。劉、魯兩家之說，略有不同。⁹魯迅又進一步把提倡「華麗」論證為「文學的自覺」：

丕著有《典論》，現已失散無全本，那裏面說：「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 (Art for Art's Sake) 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為主，故於華麗以外，加上壯大。¹⁰

引文之末的「壯大」，約略同於《講義》的「騁詞」。《講義》第三課後的「附錄」收入禰衡〈弔張衡文〉，劉師培有案語云：

東漢之文，均尚和緩，其奮筆直書，以氣運詞，實自衡始。〈鸚鵡賦序〉謂「衡因為賦，筆不停輟，文不加點」，知他文亦然。是以漢魏文士，多尚騁辭，或慷慨高厲，或溢氣坌涌（孔融〈薦禰衡疏〉語），此皆衡文開之先也（孔融引重衡文，即以此啟。故融之所作，多範伯喈，惟荐衡表，則效衡體，與他篇文氣不同）。¹¹

⁷ 《魯迅全集》，第3卷，頁502-3。

⁸ 《講義》劉師培原注：「見〈楊賜、蔡邕傳〉。」案《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楊賜傳〉云：「〔賜曰〕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頁1780）又〈蔡邕傳〉云：「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憇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頁1991-92）據〈靈帝紀〉，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李賢注：「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時其中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召能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頁340-41）

⁹ 張朝富對鴻都門學有深入的論析，他認為由曹操開始，曹氏政權即與鴻都門學的政治文化取向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見張朝富：《漢末魏晉文人群落與文學變遷——關於中國古代「文學自覺」的歷史闡釋》（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頁113-83。

¹⁰ 《魯迅全集》，第3卷，頁504。

¹¹ 《遺書》，頁2372-73。

〈風度〉則說：

〔孔融和禰衡〕早是「以氣為主」來寫文章的了。故在此我們又可知道，漢文慢慢壯大起來，是時代使然，非專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華麗好看，卻是曹丕提倡的功勞。¹²

儘管劉、魯兩家對孔融和禰衡的文風異同看法不盡一致，但魯迅的「以氣為主」仍是劉師培「以氣運詞」的意思，把「騁詞」換成「壯大」，只是令詞義更為明晰。¹³

日後不少學者沿用「清峻」、「通悅」這些用語，如得魯迅親炙的臺靜農說，曹操的政治特色是名法，與兩漢儒術完全相反，「在這種政治作風之下，影響到文學方面的，便是清峻的風格。所謂清峻，即簡練明快的意思。其次便是尚通悅，即自由抒寫的意思」。¹⁴臺氏解釋兩個詞語並不違背《講義》，但行文表達更接近〈風度〉。中古文學專家林文月是臺靜農的學生，所撰〈蓬萊文章建安骨——試論中世紀詩壇風骨之式微與復興〉，依從師說，認為清峻、通悅是曹操政治作風在文學上的影響。¹⁵另一位學者唐翼明撰有〈論「通悅」——建安時代的思想解放與文學革新〉，是至今闡釋「通悅」最詳盡的論文。唐氏認為「通悅」本用來形容一種有意打破禮法的處世態度，這種態度的出現有其社會原因，而「作為意識形態方面的上層建築之一的文學，不僅在內容上必然反映那個時代的變化及其思潮，而且在形式上，在其自身變化的軌跡上也必然打上那個時代及其社會思潮的深刻的烙印」，¹⁶所以漢末魏晉的文學創作在內容、形式、體裁上，都可以用「通悅」來解釋。這幾位學者的他律論立場與劉師培、魯迅一致，但提到的建安文學特徵，由四個減為兩個、一個不等，引發我們思考為甚麼這些特徵可多可少，其間究竟有甚麼關係。¹⁷

別具慧眼的是王瑤，他在〈曹氏父子與建安七子〉裏也引述了《講義》第三課的總述，但認為劉師培「是根據各種文體的現象來和兩漢比較說的」，「『清峻』指論說奏

¹² 《魯迅全集》，第3卷，頁506。

¹³ 「以氣為主」出自曹丕的《典論·論文》，原非「壯大」之意，曹丕的詩文風格也不以壯大見稱，魯迅的解釋並不正確。參樊善標：〈清濁陰陽辨——曹丕「以氣論文」再詮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11期（2002年），頁359-86。

¹⁴ 臺靜農：〈魏晉文學思想述論〉，載羅聯添（編）：《中國文學史論文精選》（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頁395。

¹⁵ 林文月：《中古文學論叢》（臺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頁8。

¹⁶ 唐翼明：《古典今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頁9。

¹⁷ 臺靜農、林文月沒有提到華麗、壯大，唐翼明則說「『通悅』實在是建安文學最重要和最本質的特徵」（頁24），但為甚麼「清峻」和「通悅」，或僅僅「通悅」，是最重要的特徵，卻都沒有交代理由。羅宗強指出，「當時士人也並非都尚通脫」，建安七子中的徐幹就「完全是和通脫相對立的」，同時的王昶、蔣濟、杜恕也都和徐幹相近。見羅宗強：《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2-14。

議各體文字的注重簡約嚴明；『通悅』指由偏狹的清節和道德觀念解放出來的士風對詩賦內容所產生的抒情詠懷的影響。¹⁸《講義》本來還有以下一段話，引者不多，但王瑤也引用了：「魏文與漢不同者，蓋有四焉：書檄之文，騁詞以張勢，一也；論說之文，漸事校練名理，二也；奏疏之文，質直而屏華，三也；詩賦之文，益事華靡，多慷慨之音，四也。」¹⁹這段話字面上已有「騁詞」、「華靡」；「校練名理」為刑名家的特徵，²⁰故即「清峻」；「多慷慨之音」則與「悅則侈陳哀樂」相通。此外還增加了「質直屏華」。這些風格分別屬於不同文類（文體），王瑤的根據正在此處，但他又批評說：

劉氏指出了這些文學史上的現象，原可寶貴；但我們上面所述的建安文學的基本特徵，卻並不簡略；這因為我們現在既不注重分別文體來說明，而這些現象之所以存在，又都可從前面的分析中得到了它的解釋。²¹

所謂「建安文學的基本特徵」，指當時文人「悲涼清越的慷慨情緒」是他們的「生活特徵」，「因而也就成了建安詩文的時代特徵了」。²²王瑤很明白他和劉師培的分別，在於有沒有提出共同表現於各種文體（文類）的時代特徵。其實不僅王瑤，魯迅、臺靜農等和劉師培的分別也在於，是否把「文學」當作一個整體的概念來把握。

從「講義」到「文學史」

《講義》源於劉師培在北京大學開設的「中古文學史」課程。1917年秋，劉氏應北大校長蔡元培之聘，擔任文科教授。翌年開設「中古文學史」，為本科二年級課程。²³再一年十一月，劉氏逝世。北京大學出版部在1923年鉛印出版「中古文學史」的講義，經

¹⁸ 王瑤：《中古文學風貌》（香港：中流出版社，1957年），頁25-26。

¹⁹ 第三課「附錄」最後一條案語，見《遺書》，頁2377。

²⁰ 《文心雕龍·論說》篇云：「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見范文瀾：《文心雕龍註》（香港：商務印書館，1960年），頁327。

²¹ 《中古文學風貌》，頁26。

²² 同上注，頁13。

²³ 萬仕國《劉師培年譜》（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說：「1917-1918學年擔任的課程有：中國文學（一年級、二年級，每週各三小時），中國古代文學史（二年級，每週三小時）。」（頁262）又說：「本年〔1917年〕，劉師培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古文學史，並開始編輯《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頁264）兩處不相應。其實劉師培任職北大期間，一直講授中古文學史，但課程的名目曾經改變。查《北京大學日刊》，得知1917-1918學年的第一學期，劉氏講授的課程確如萬仕國所列，但由第二學期開始，文本科修訂課程，劉氏開授「中古文學史」，第三學期亦然。1918-1919學年的三個學期也安排了劉氏任教「中古文學史」，但《日刊》在1918年9月之後不再刊登各科的課程表，所以不知道劉氏有沒有完成第二、三學期

〔下轉頁252〕

名為《中古文學史》，魯迅購得的當是這一版本。²⁴蔡元培〈劉君申叔事略〉說：「余長北京大學後，聘君任教授。君是時病瘵已深，不能高聲講演，然所編講義，元元本本，甚為學生所歡迎。」²⁵此文為《劉申叔遺書》出版而作，固有美言的需要，這段話用於《講義》卻非過譽，後來浦江清批評《講義》「僅輯材料，不成史書」，顯然不公允。²⁶然而，如果讀者期待以敘述為主的文學史體式，²⁷《講義》卻要求他們「清醒而自覺地尋找脈絡與系統」，其間的確大有落差。²⁸晚近學者出於補偏救弊，重新發掘早期文學史寫法的優點，²⁹他們的意見自有合理之處。不過必須明白，在劉師培心目中，《講義》並非文學史的完美形態，不能僅據此書來印證他的文學史寫作理念。劉師培在逝世前半年發表〈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一文，開首即說：

文學史者，所以考歷代文學之變遷也。古代之書，莫備于晉之摯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別》。志者，以人為綱者也；流別者，以文

〔上接頁 251〕

的教學。在 1917 年的舊課程，一年級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古訖建安）」由朱逋先（希祖）任教，二年級的「中國古代文學史」由朱逋先、劉申叔各教一班，三年級的「中國近代文學史（唐宋訖今）」由吳瞿安（梅）任教，三科一脈相承，由此可知在 1917 年 9 月開學的舊課程第一學期，劉師培講授的本來就是中古文學。見《北京大學日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以下各期：1917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9 日、12 月 11 日、12 月 29 日、1918 年 1 月 5 日、4 月 12 日、9 月 14 日、9 月 26 日。

²⁴ 魯迅 1924 年 5 月 23 日的日記說：「買《中古文學史》、《詞餘講義》、《文字學形義篇》及《音篇》各一本，共泉一元。」見《魯迅全集》，第 14 卷，頁 498。又《魯迅全集》第 15 卷「書刊注釋」：「〔《中古文學史》〕一冊。劉師培編著。一九二三年北京大學出版部鉛印本，北京大學文科一年級教材。」（頁 616）此書實為二年級教材。

²⁵ 《遺書》，頁 18 上。

²⁶ 浦江清：〈鄭振鐸《中國文學史》〉，載《浦江清文史雜文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128。《講義》排列材料分門別類，都有用意，第三、四、五課的總述，引錄資料後的案語等，都是劉師培自己的見解，並非「僅輯材料」。

²⁷ 葛兆光指出早期的中國文學史採用「陳列」式寫法，臚列相關作者的傳記、篇章及評語；西洋文學史和後來的中國文學史則採用「敘述」式寫法。見葛兆光：〈陳列與敘述——讀謝无量《中國大文學史》〉，載陳平原、陳國球（主編）：《文學史（第一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351-55。

²⁸ 這是葛兆光對「陳列」式文學史的看法。葛氏又指「敘述」式的文學史「用彬彬有禮的所謂『敘述』強加於人，把一部文學史『佔為己有』並仍掛着『史』的招牌」。見葛兆光：〈陳列與敘述〉，頁 354。

²⁹ 如周月亮說，「讀這部書像走入一條關於中古文學的卡片長廊」，認為「這種做法的確更凸現了史本身」。見周月亮：〈輯錄與案語——讀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載陳平原、陳國球主編：《文學史（第二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340。

體為綱者也。今摯氏之書久亡，而文學史又無完善課本，似宜仿摯氏之例，編纂《文章志》、《文章流別》二書，以為全國文學史課本，兼為通史文學傳之資。³⁰

在1906、1907年間劉師培曾編寫倫理、經學、中國地理等教科書多種，³¹每課內容簡短淺白，大抵適用於小學至初中。³²〈蒐〉文的「全國文學史課本」不知道設定在甚麼程度，但劉氏編纂《文章志》的原則，卻是旁蒐博採歷代文獻，³³這裏所說的「課本」顯然與教科書不同。《講義》徵引廣洽完備，符合〈蒐〉文的原則。全書核心的第三至五課中，前兩課都以「變遷」為標題，第五課雖名為「概略」，但「總論」一節仍是從文學變遷的角度來組織材料、附加案語。³⁴這樣看來，《講義》似乎近於《文章流別》，但〈蒐〉文又說《文章志》和《文章流別》只是撰寫「通史文學傳之資」，《講義》當然未符合理想。可惜劉氏不久病逝，來不及編纂《文章志》，遑論實踐撰寫「通史文學傳」的大計了。

然而，上過劉氏課的楊亮功回憶說：

劉申叔先生教中古文學史，他所講的是漢魏六朝文學源流與變遷。他編有「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但上課時總是兩手空空，不攜帶片紙隻字，源源本地一直講下去。聲音不大而清晰，句句皆是經驗之言。³⁵

³⁰ 《遺書》，頁1655下。原刊《國故月刊》，第3期（1919年5月）。原刊資料據萬仕國：《劉師培年譜》，頁280。

³¹ 《遺書》錄入《倫理教科書》、《經學教科書》、《中國文學教科書》、《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國地理教科書》，萬仕國《劉申叔遺書補遺》（揚州：廣陵書社，2008年；下稱《補遺》）增錄《江甯鄉土歷史教科書》、《江甯鄉土地理教科書》、《江蘇鄉土歷史教科書》、《江蘇鄉土地理教科書》、《安徽鄉土歷史教科書》。其中《中國文學教科書》內容實為文字、聲韻、訓詁之學。劉師培編寫教科書年份據萬仕國《劉師培年譜》所列各書敘發表日期推斷（頁90-91，132-35）。

³² 《中國地理教科書·凡例》言「以備高等小學及中學第一年之用」（《遺書》，頁2273）。各鄉土歷史及地理教科書則遵照〈奏定學堂章程〉編寫，供初等小學第一、二年（地理教科書則兼包第三年上學期）之用，見《補遺》，頁465，495，505，543，554。

³³ 〈蒐〉文提出從四個方面蒐集材料：「就現存之書分別採擇也」、「就既亡各書鉤沈摭逸也」、「古代論詩評文各書必宜詳錄也」、「文集存佚及現存篇目必宜詳考也」，又一再強調採輯務須窮盡一切有用資料，如「全史之文，均應按卷披閱，其涉及文學者，單句隻詞，均宜摘采」；「凡漢魏六朝逸史，以及既佚子書，均宜博采」。見《遺書》，頁1655-56。

³⁴ 《講義》各課標題如次：第一課「概論」、第二課「文學辨體」、第三課「論漢魏之際文學變遷」、第四課「魏晉文學之變遷」、第五課「宋齊梁陳文學概略」。

³⁵ 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頁15。

《講義》主要是輯錄資料，但劉氏授課並非照本宣科。³⁶《講義》沒有把資料聯綴起來，編織進整段的敘述文字裏，講課時卻有很多發揮，甚至以己見為主，儘管與後來學者要求的「一以貫之」仍有距離。³⁷羅常培上過劉氏好幾門課，有詳細的筆記，可惜只出版了《漢魏六朝專家文》和兩篇《文心雕龍》的「口義」。³⁸現在考察劉師培後期的文學史觀念，只能由《講義》入手，但是不能拘泥於其體式，畢竟從《講義》到「講課」再到「通史文學傳」，已隔了不止一重的關係。

³⁶ 馮友蘭也有類似的記述：「蔡元培聘請劉師培為中國文學教授，開的課是中國中古文學史。我也去聽過一次講，當時覺得他的水平確實高，像個老教授的樣子，雖然他當時還是中年。他上課既不帶書，也不帶卡片，隨便談起來，就頭頭是道。援引資料，都是隨口背誦。當時學生都很佩服。他沒有上幾課，就病逝了。」見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310。最後一句不正確，考辨已見上文。

³⁷ 例如第一課「概論」和第二課「文學辨體」，在《講義》裏用來界定「文」的範圍，即「偶詞韻語」，但第三至五課談論的都不止是「文」，還有非偶詞韻語的「筆」。朱自清說早期的中國文學史，「敘述的綱領是時序，是文體，是作者；缺少的是『一以貫之』」。見朱自清：〈甚麼是中國文學史的主潮？〉，載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卷，頁208。

³⁸ 羅常培記他在大學第二年（1917-1918），「用功的重心放在劉師培先生的中古文學和中古文學史上。在講堂要把他的『口義』用速記記錄，回家後又逐字逐句地翻譯成文言。現在我雖然保留一部最完整的筆記，預備編成《左盦全集》所沒收入的《左盦文論》四卷，可是在當年真不知道花了多少冤枉功夫」。見羅常培：〈自傳〉，載楊揚等（選編）：《學人自述》（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68。《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文心雕龍·頌贊篇》、〈《文心雕龍·誄碑篇》口義〉，皆收於《補遺》。羅常培又說：「曩年肄業北大，獲從儀徵劉申叔先生研究文學。不賢識小，輒記錄口義，以備遺忘。遇有闕漏，則從亡友天津董子如（威）兄抄補。日積月累，遂亦哀然成帙。綜計兩年之所得，有（一）群經諸子、（二）中古文學史、（三）文心雕龍及文選、（四）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四種。總名為『左庵文論』。廿年以來，奔走四方，興趣別屬，稿置行篋，理董未遑。友人知有此稿者，每從而索閱。二十五年，錢玄同先生為南桂馨氏輯刻《左盦叢書》，亦欲以此刊入，均以修訂有待，未能應命。非敢敝帚自珍，實恐示人以璞。今值《國文月刊》編者余冠英先生頻來索稿，乃囑趙君西陸將《文心雕龍》節記一卷抽暇校訂，陸續刊佈，藉以慰劉、錢兩先生及亡友董君。至於《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則另於《文史雜誌》發表云。」見羅常培：〈弁言——左庵文論之四〉，載《補遺》〈文心雕龍頌贊篇〉前，頁1553。考《北京大學日刊》，除了「中國古代文學史」和「中古文學史」外，劉師培在文本科講授的科目還有：1917學年第一學期「中國文學」（一、二年級），第二、三學期「古代文學」（一、二年級合班），1918學年「文」（三年級），出處同注23。《補遺》另收錄《中國文學講義概略》一冊，為劉氏在北大授課時發給學生的講義。據其目錄，包括《尚書》、《毛詩》、《春秋左氏傳》、《春秋國語》、《三禮經記》、《諸子》、《楚辭》、《國策及周秦雜文》。該冊缺後三種。《漢魏六朝專家文》及兩篇《文心雕龍》口義，或為1918學年三年級「文」的筆記。

文學變遷的方向

劉師培說文學史的任務是「考歷代文學之變遷」，這是很恰當的概括，問題複雜之處是怎樣詮釋「變遷」。劉氏早年主張文學有一個固定的變遷方向，1905年發表的〈文章原始〉說：

降及唐代，韓、柳嗣興，始以單行易排偶，由深趨淺，由簡入繁，由駢儷相偶之詞，易為長短相生之體，與詩歌易為詞曲者，其理相同（詩由四言而五言，由五言而七言，由七言而有長短句，遂為詞曲）。昔羅馬文學之興也，韻文完備，乃有散文，史詩既工，乃生戲曲（見澠江保《羅馬文學史》）。而中土文學之秩序，適與相符，乃事物進化之公例，亦文體必經之階級也。（事物之理，莫不由簡而趨繁，何獨於文字而不然乎？）³⁹

「由深趨淺，由簡入繁」，都是指詩文的句式從偶語變為單行。這一段話雖然是說唐代文章，但既謂「進化之公例」，自然不限於一個時代。劉氏更從日本人的《羅馬文學史》中發現，中西文學的進化次序相同，稱為「公例」就更有根據了。⁴⁰劉氏同年又撰〈論文雜記〉，其第二篇云：

英儒斯賓塞耳有言：「世界愈進化，則文字愈退化。」夫所謂退化者，乃由文趨質，由深趨淺耳。及觀之中國文學，則上古之書，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簡質，崇用文言。降及東周，文字漸繁；至於六朝，文與筆分；宋代以下，文詞益淺，而儒家語錄以興；元代以來，復盛興詞曲。此皆語言文字合一之漸也。故小說之體，即由是而興，而《水滸傳》、《三國演義》諸書，已開俗語入文之漸，陋儒不察，以此為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簡趨繁，何獨於文學而不然？⁴¹

斯賓塞耳 (Herbert Spencer) 是英國社會學家，也是第一個把生物進化論應用於人類社會的學者，後人稱其學說為社會進化主義，劉師培曾多次引用他的言論。⁴²清末社

³⁹ 《遺書》，頁 1646。

⁴⁰ 晚清思想界常把他們介紹的西方新思想稱為公理、公例，以表示此為具普遍性的知識、真理，但往往未有充分考察。參王中江：《進化主義在中國》（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 134-36。又，李帆列出劉師培徵引過的西方和日本著作、學者，屬於文學類的只有澠江保《羅馬文學史》一種，見李帆：《劉師培與中西學術——以其中西交融之學和學術史研究為核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 83-87。劉氏的外國文學知識恐怕不大豐富。

⁴¹ 《遺書》，頁 711。

⁴² 劉師培《攘書》、〈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論古學出於史官〉、〈周末學術史序〉，都徵引斯賓塞《社會學原理》（馬君武譯，少年中國新叢書之一，少年新中國社 1903 年印），〈論

〔下轉頁 256〕

會進化主義風靡朝野，李帆認為「中國學者在清末引入西方社會學，首先系統介紹的便為斯賓塞學說」，原因「恐與其所闡釋的進化論密切相關」。⁴³實際上時人最熱心的是把「天擇說」轉用於民族救亡圖存的討論，他們所理解的「進化論」已經和達爾文的生物學觀點十分不同了，⁴⁴而這種對「進化」的理解又滲透到更大的範圍，文學正是其一。⁴⁵劉氏這裏引述斯賓塞的話未能查得出處，但由於對文字「由簡趨繁」的評價不同，竟至斥之為陋儒，很符合劉氏早年激烈的作風。⁴⁶在劉氏心目中，深淺、簡繁、文質這三組對立的概念是同一歷程的不同描述，「文字」與「文學」的變化互為表裏，所以上面那段話開始時說「文字」「由文趨質，由深趨淺」，總結時則說「文學」「由簡趨繁」。劉氏把深淺等概念納入駢散的對立中，又把由駢到散的變化說成文類演變和文學進化的次序，可見劉氏的文學進化其實是文字（語言）體式的變遷。錢基博把劉師培的主張總結為「論小學為文章之始基，以駢文實文體之正宗，本於阮元者也」，並引錄〈文章原始〉全文為證，⁴⁷但從本節之初引用的劉氏言論可見，他在推尊駢文之外，還深受社會進化主義的影響。兩者時起衝突，無法融貫為一。

阮元推尊駢文之說見於所著〈文言說〉、〈文韻說〉、〈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等篇。阮元認為「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以口舌傳事者多」，「是必寡其詞，協其音，

〔上接頁255〕

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周末學術史序〉、《經學教科書》皆徵引《群學肆言》（嚴復譯，文明編譯書局1903年出版），〈小學發微補〉、《倫理教科書》、〈無政府主義之平等觀〉、〈論中土文字有益於世界〉皆引斯賓塞之言。見李帆：《劉師培與中西學術》，頁71-87。Spencer一般譯為斯賓塞，除引文外，本文採用一般譯法。

⁴³ 李帆：《劉師培與中西學術》，頁91-92。

⁴⁴ 王中江詳細討論了嚴復對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和斯賓塞兩種進化論詮釋的取捨，赫胥黎的 *Evolution and Ethics* 拒絕把達爾文的理論運用到社會領域中，嚴復翻譯了此書，即著名的《天演論》，但他更欣賞斯賓塞的社會進化主義。見王中江：《進化主義在中國》，頁62-69。楊照指出，達爾文的「天擇」本來指同種之間的競爭，後人把它和另一位生物進化論學者拉馬克（Jean Baptiste Pierre Antoine de Monet de Lamarck）的「演化方向」說結合起來，競爭變為在異種之間進行，由此產生了一種影響深遠的社會觀念，即高等的生物有權利淘汰低等的生物。見楊照：《還原演化論：重讀達爾文〈物種起源〉》（臺北：麥田出版，2009年），頁122。這種社會觀念在晚清以降的國人看來，深刻地反映了民族的危機。

⁴⁵ 胡適的白話文學觀是最著名的例子，參胡適（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影印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初版，2003年），〈導言〉，頁1-32。

⁴⁶ 劉師培曾撰〈論激烈的好處〉，原刊《中國白話報》，第6期（1904年3月1日），署名「激烈派第一人」；收入李妙根：《劉師培論學論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335-38。

⁴⁷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重印作者第四版增訂本，2007年），頁105。

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寫成文章亦須如此。孔子撰《易·文言》既押腳韻，又用偶句，可謂「千古文章之祖」。⁴⁸因此，凡稱為「文」的，都要符合聲、色要求，即「在聲為宮商，在色為翰藻」。這裏的「聲」已擴展為文章的韻律，所以阮元宣稱「四六乃有韻文之極致」；⁴⁹但「文」的起源僅追溯至孔子，孔子以前的文獻怎樣處理？阮元說：

凡以言語著之簡冊，不必以文為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為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為文也。⁵⁰

原來阮元的「文」是與「經」、「史」、「子」同一層次的類目，他所爭的是與「文」這一類目之「名」相副的「實」，而他的論爭對手則是當時聲勢浩大以「古文」為號召的桐城派。⁵¹劉師培繼承了阮元以駢文對抗桐城古文的立場，⁵²但他的「文」廣泛涵蓋一切文字著作。〈文章原始〉歷敘上古至唐代文章體式的變化，由語言、文字的關係說起：「積字成句，積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緣起，先窮造字之源流。」⁵³劉氏根據《廣雅》、《玉篇》等書「字，飾也」的古訓，認為「字」的取義與「文章」相同。⁵⁴上古時文字雖興，但抄寫不便，學術多賴口耳相傳，「必雜於偶語韻文，以便記誦，而語言之中有文矣」，後來著於書冊，「書冊之中亦有文」。⁵⁵劉氏解釋「偶語韻文」出現的原因與阮元無二，但阮元並不著重時間因素，孔子之前的文獻他不予討論。劉師培則強調歷史發展的線索，把「〔文〕字」和「文〔章〕」的本質同時界定為修飾性，由文字到文章一

⁴⁸ 阮元：〈文言說〉，載舒蕪等（編選）：《近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100。

⁴⁹ 阮元：〈文韻說〉，載《近代文論選》，頁104，102。該文把〈文言說〉的「協其音」推展至「押腳韻」以外的「章句中之音韻」，並認為「昭明所選不押韻腳之文，本皆奇偶相生而有聲音者，所謂韻也」。

⁵⁰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載《近代文論選》，頁105-6。

⁵¹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接着說：「非文者，尚不可名為文，況名為古文乎！」

⁵² 阮元〈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云：「自齊、梁以後，溺於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近代文論選》，頁105）劉師培〈文章原始〉云：「是則文也者，乃經史諸子之外，別為一體者也。齊梁以下，四六之體漸興，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靡曼纖冶，文體亦卑。然律以沈思翰藻之說，則駢文一體實為文體之正宗。」又云：「近代文學之士，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於方、姚之文奉為文章之正軌，由斯而上則以經為文，以子史為文，由斯以降，則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遺書》，頁1646）所論與阮元同出一轍。

⁵³ 《遺書》，頁1644。

⁵⁴ 「故『字』訓為『飾』」句，劉氏原注：「古人以字為文飾之義，飾即文也。」「與『文章』之訓相同」句，劉氏原注：「文章取義於藻繪，言有組織而後成文也。」（《遺書》，頁1645）

⁵⁵ 《遺書》，頁1645。

脈貫通，為以「偶語韻文」為特徵的駢文，爭得出現次序的優勢，但這樣做也有後果，那就是要全盤面對歷史發展的細節。

首先，即使承認「字」與「文章」取義相同，但兩者的「文飾」方式不是同一回事。文章的「文飾」表現為「偶語韻文」，「偶語韻文」是否必定較單行無韻為早？考諸文獻，並非必然。⁵⁶那麼他的結論其實仍然只是阮元式的循名責實，無法貫徹歷時性的論述。其次，「由簡趨繁」、「由文趨質」是直線的發展，而駢文的高峰在六朝，文章駢句由少而多、又由多而少，是拋物線的發展，劉氏怎樣把兩種發展圖式融合為一？

〈論文雜記〉第九篇雖然也說「由簡趨繁」是「文章進化之公例」：

西漢之書，言詞簡直，故句法貴短，或以二字成一言，而形容事物，不爽錙銖。東漢之文，句法較長，即研煉之詞，亦以四字成一語。魏代之文，則合二語成一意（……非此不能盡其意也，已開四六之體）。由簡趨繁（此文章進化之公例也），昭然不爽。⁵⁷

但是和本節最初所引〈文章原始〉「由簡入繁」的內涵恰好相反。〈文章原始〉指由排偶變為單行，〈論文雜記〉第九篇則指由單行短句變為四六之體，然而〈文章原始〉說的是唐代的情況，〈論文雜記〉說的則是由漢至魏的演變。劉氏為了照顧歷史事實，改換了「簡」、「繁」的實質，以維持「由簡趨繁」的表述，兩種圖式積不相容，於此彰彰明甚。

把簡繁、文質、深淺和駢散機械對應，而且賦予先後進化的關係，本就可疑。最低限度在直觀上「由質趨文」似乎比「由文趨質」更合理，⁵⁸劉氏不此之圖，當是為了確立駢文為文章本源的優越地位。劉氏嘗試解釋為甚麼早期的文章既「簡」又「文」：

秦漢以降，文與古殊。由簡而繁，至南宋而文愈繁；由文而質，至南宋而文愈質。蓋由簡趨繁，由於駢文之廢，故據事直書，不復簡約其文詞；由文趨質，由於語錄之興，故以語為文，不求自別於流俗。⁵⁹

⁵⁶ 〈文章原始〉云：「吾觀三代之書，諺語箴銘，實多韻語。若六藝之中，《詩》篇三百固皆有韻之詞，即《易》、《書》二經，亦大抵奇偶相生，而《爾雅·釋訓》用韻者亦三十條。惟戴《禮》、《周官經》言詞簡質，不雜偶語韻文，則以昭書簡冊，懸布國門，猶後世律例公文，特設專門之文體也，故與文言不同。」（《遺書》，頁164）在最早的文獻中，只是「多」韻語、奇偶「相生」，更有不雜偶語韻文的，不得不另立一類，與同篇所引澀江保《羅馬文學史》由韻文到散文的發展「公例」無法一致。

⁵⁷ 《遺書》，頁714。

⁵⁸ 如羅惇齋就認為發展的方向是由質到文：「文學由簡而趨繁，由疏而趨密，由朴而趨華，自然之理也。」見羅惇齋：〈文學源流〉，原刊《國粹學報》，第2年（1906年）第4-9號（農曆四月二十日至八月二十日）；收入《近代文論選》，頁620。

⁵⁹ 見〈論文雜記〉第十三篇，載《遺書》，頁717。

但是這裏解釋「由簡而繁」的理由，又和〈論文雜記〉第九篇魏代「合二語成一意，由簡趨繁」恰恰相反了。此外，第九篇說西漢文章「言詞簡直」，魏代則「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靡曼纖冶」，不正是「由質趨文」？其實第二篇說上古之書「力求簡質，崇用文言」，既「質」又「文」，已暴露了「公例」的左支右絀。⁶⁰

在劉師培後期的《講義》中，不僅沒有「進化」一詞，連文字、文學進化的既定方向也不復提出。偶然談到較長時段的變化趨勢，也不用簡繁、文質這些對立概念，儼然要與早年論說劃清界線，如第三課「論漢魏之際文學變遷」說：「孔璋之文，純以騁辭為主，故文體漸流繁富。……文之由簡趨煩，蓋自此始。」⁶¹又說：「蓋文而無實，始于斯時。……文勝之弊，即此可睹。故援引其說〔案：指桓範《世要論·序作篇》〕，以見當時文學之得失，亦以見文章各體，由質趨華，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⁶²儘管說「文章各體，由質趨華」，但並非真正的整體趨勢，因為這時候的「奏疏之文，質直而屏華」。⁶³

進化主義的痕跡，在《講義》裏已不明顯。⁶⁴表面看來，劉師培是由趨新轉向守舊，但是我們還注意到，《講義》也改變了早期論著對時間性的處理，因而更符合文學史「考歷代文學之變遷」的要求，這一點在以下兩節說明。

「探源於六經諸子」的文章流別說

除了「論小學為文章之始基，以駢文實文體之正宗，本於阮元」，錢基博又指出劉師培另外兩個文學史觀點的淵源：「論文章流別同於諸子，推詩賦根源本於縱橫，出之章學誠者也。」⁶⁵劉氏〈論文雜記〉第十二篇把古今文人詩人、歷代文風分別比附於儒道陰陽諸家，⁶⁶第十四篇論詩賦之學出於行人之官，「後世詩集皆縱橫家之派別」，⁶⁷

⁶⁰ 在一年之前，《警鐘日報》的「社說」〈質文篇〉（1904年5月1、2日），提出一種相反的「進化公理」：「夫世界遞遷，由野而文，斷無反樸歸真之一日。此進化之公理也。……吾觀西人社會學，謂事物之理，莫不由簡趨繁，故政治日即乎新，即物質文明，亦日有進步。……今中國不欲文則已，欲自進文明之域，則舍『從文舍質』，別無進化之可言。」（《補遺》，頁194）此篇無署名，萬仕國認為是劉師培所作。

⁶¹ 第三課「附錄」，載《遺書》，頁2373。

⁶² 第三課案語，載《遺書》，頁2372。

⁶³ 第三課「附錄」案語，載《遺書》頁2377。整段文字在前文「《講義》與〈風度〉的分野」一節已引錄。

⁶⁴ 「進化」之外，「天演」、「公例」等詞語也不見於《講義》，而以「變遷」、「遷蛻」等詞表示變化之意。

⁶⁵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頁105。

⁶⁶ 《遺書》，頁716-17。

⁶⁷ 同上注，頁719。

錢基博把兩文全篇錄入其書中。第十二篇之末劉氏原注說：「會稽章氏、仁和談〔譚〕氏稍知此義，惟語焉未精，擇〔釋〕焉未詳。故更即二家之言推論之，以明其凡例焉。」⁶⁸會稽章氏即章學誠，仁和譚氏即譚獻。譚獻《復堂類稿·明詩》說：

夫六藝既散，百家代興；晚周以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為文章之盛。世有別集，蛇龍之菹，名法儒墨，若遠若近，若出若入，甚矣其衰也。劉、班敘詩賦，亦復稱家，分別部居，言各有當，惜乎今日亡佚殆盡，無能詳說作者之旨。後來文士，如阮籍為道家，陶潛為儒家，謝靈運為名家，江淹為縱橫家之屬，凡夫學有本末，皆有合於微言大義者也。⁶⁹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下》說：

是則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餘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章之士也。⁷⁰

章氏的名言「辨章學術」，劉師培也沿用不疑，⁷¹但是黃霖認為劉氏幾次考察文章流別，「角度和內涵大不一樣」：論歷代文章出於子部，「基本上就作品的思想傾向而言」；論詩賦出於縱橫家，則「是從『溯源』的角度而論」。⁷²其實即使是「溯源」，主題、技巧、風格、表達模式等都是上通下達的途徑。選擇不同，得到的結果就不一樣，例如〈論文雜記〉第四篇說《楚辭》為詞賦鼻祖，「〈離騷〉、〈九章〉音涉哀思，……詩歌比興之遺也；〈九歌〉、〈招魂〉指物類象，……〈史篇〉記載之遺也。是《楚詞》一編，隱含二體」；⁷³第八篇卻認為《漢書·藝文志》所錄之賦中，「寫懷之

⁶⁸ 同上注，頁717。

⁶⁹ 《近代文論選》，頁351。

⁷⁰ 葉瑛：《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80。

⁷¹ 章學誠〈校讎通義敘〉云：「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以與此。」（《文史通義校注》，頁945）劉師培〈論文雜記〉第十二篇云：「由是言之，辨章學術，詩與文同矣。」（《遺書》，頁717）

⁷² 黃霖：《中國文學批評通史——近代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790-91。劉師培考察流別之論，如〈論文雜記〉第十二篇云：「要而論之，西漢之時，治學之士，侈言災異五行，故西漢之文，多陰陽家言。東漢之末，法學盛昌，故漢魏之文，多法家言。六朝之士，崇尚老莊，故六朝之文多道家言。」（《遺書》，頁717）第十四篇云：「《漢志》敘〈詩賦略〉，謂『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際，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故孔子言：『不學詩，無以言。』』夫交接鄰國，揖讓喻志，咸為行人之專司。行人之術，流為縱橫家，故《漢志》敘縱橫家，引『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之文，以為大戒。誠以出使四方，必當有得于詩教。則詩賦之學，實惟縱橫家所獨擅矣。」（《遺書》，頁718）

⁷³ 《遺書》，頁712。劉氏又云：「〈史篇〉起源，始於倉聖，周官之制，太史之職掌論書名，

[下轉頁261]

賦，其源出於《詩經》；騁詞之賦，其源出於縱橫家；闡理之賦，其源出於儒道兩家」。⁷⁴那麼詞賦究竟是出於縱橫家，還是兼有《詩經》、縱橫、儒、道四個本源？再比較劉氏另一處的說法：

如論說之體，近人列為文體之一者也，然其體實出於儒家；書說之體，亦近人列為文體之一者也，然其體實出於縱橫家。推之奏議之體，《漢志》附列於六經；敕令之體，《漢志》附列於儒家。又如傳記箴銘，亦文章之一體，然據班《志》觀之，則傳體近於《春秋》，記體近於古禮，箴體附於儒家，銘體附於道家。是今人所謂文者，皆探源於六經諸子者也。⁷⁵

同樣是文類的起源，書說與縱橫家的關係和以上各篇論詞賦與縱橫家的關係，也不相同。劉氏所謂文章源流，與其理解為實證研究，毋寧說是分類方法，即以一種年代較早的分類框架（六經諸子），投射到後代，把後代的作家、作品分門別類，彰顯其差異。第十二篇除了敘述歷代文風，又把個別作家歸類於先秦某子，例如：「韓、李之文，正誼明道，排斥異端，歐、曾繼之，以文載道，儒家之文也。子厚之文，善言事物之情，出以形容之詞，而知人論世，復能探原立論，核覈刻深，名家之文也。」韓、李、歐、曾歸於儒家是就內容言，柳宗元歸於名家則是就風格言。同一段話，標準不一。又如：「淵明之詩，澹雅沖泊，近於道家。」⁷⁶與譚獻說「陶潛為儒家」不同。這些議論都沒有充分的理據。

劉師培在這些文章裏一再提到「文章流別」，⁷⁷這名目來自晉人摯虞。摯氏分體選文，又歷敘各體源流正變，編撰成《文章流別集》，其書久佚，只剩下若干摯氏談論文類的片斷。⁷⁸像摯虞這種研究文學的方式，後人稱為辨體之學，是中國傳統文論的重要內容。⁷⁹論者認為研究文章流別源於編纂總集和擬仿古人的需要，編輯總集須

〔上接頁 260〕

而宣王之世，復有史籀作〈史篇〉。書雖失傳，然以李斯〈倉頡篇〉、史游〈急就篇〉例之，大抵韻語偶文，便於記誦，舉民生日用之字，悉列其中，蓋〈史篇〉即古代之字典也。」（《遺書》頁 712）

⁷⁴ 《遺書》，頁 714。

⁷⁵ 同上注，頁 713。

⁷⁶ 同上注，頁 716，717。

⁷⁷ 如《論文雜記》第四篇云：「此古代文章之流別也，然知之者鮮矣。」（《遺書》，頁 712）第十二篇云：「旨歸既別，夫豈強同？即古人所謂文章流別也。」（《遺書》，頁 716）

⁷⁸ 《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摯虞傳〉云：「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頁 1427）

⁷⁹ 王瑤說：「中國的文學批評，從他的開始起，主要即是沿着兩條線索發展的——論作者和論文體。」見王瑤：〈文體辨析與總集的成立〉，載王瑤：《中古文學思想》（香港：中流出版社，1957年），頁 124。

擬定分類框架，分體選編為方便揣摩作法，兩者都以辨析體裁為先務。⁸⁰ 摯虞之後最重要的辨體之作莫過於《文心雕龍》，其書第六至二十五篇都以文類命名，分別詳述文類的源流、名義，標舉佳作，說明寫作規範，即〈序志〉篇所謂「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⁸¹《四庫全書總目》則簡約之為「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⁸² 辨別文章源流當然有很強的學理成份，但編纂文集不能純本學理，而必須照顧實際情況，於是辨體之學後世往往成為選家之學。追源溯流和分門別類兩者，在選家的實際操作上，後者通常更為吃重。⁸³ 流別本來強調文學在時間裏的變化，但當選家集中注意於作品形式的異同，空間性取代了時間性，流別就變成了分類體系。劉師培雖非選家，但談論文章流別也有此傾向，這與他從進化論接受過來的直線式演變觀念，可謂截然不同，卻又常常共存在同一篇論著裏。

直至去世那一年，劉師培仍念念不忘文章流別研究。⁸⁴〈奏定大學堂章程〉中國文學門原有「歷代文章流別」一科，林傳甲即按照「日本有《中國文學史》，可仿其意自行編纂講授」的指示，編出第一本中國人編的中國文學史，⁸⁵劉氏印象深刻未必無因。〈蒐〉文只詳述「文章志」材料的搜集方法，「文章流別」如何着手則沒有交代，但是根據「以文體為綱」來「考歷代文學之變遷」的提示，我們可以從《講義》領會劉氏的想法。這些想法與早年「探源於六經諸子」的文章流別說比較，表面相似，其實並不相同。

「文派異同」，如何言說？為何言說？

《講義》第四課〈魏晉文學之變遷〉說：「凡論文學之變遷，當觀其體勢若何，然後文派異同，可得而說。」⁸⁶ 派原指河水的支流，⁸⁷ 引伸而兼有派生和派別的意思。文派既是分類系統，也是歷時變化的形跡。文派異同不僅是第四課的內容，也適用於《講

⁸⁰ 參王運熙等：《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魏晉南北朝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75-78，117-21。

⁸¹ 范文瀾：《文心雕龍註》，頁727。

⁸² 《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集部·詩文評類敘〉，頁1779。

⁸³ 參王瑤：〈文體辨析與總集的成立〉，頁141-52。

⁸⁴ 見前文「從『講義』到『文學史』」一節所引劉師培〈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

⁸⁵ 參陳國球：〈文學立科——《京師大學堂章程》與「文學」〉，載陳國球：《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1-22。

⁸⁶ 《遺書》，頁2377。馮永敏說：「他所謂的『體勢』，即是『因情立體，即體成勢』（《文心雕龍·定勢》）之意，也就是說不同體裁形成不同風格，而不同文體風格必然影響或指導創作，因此劉師培以為在文學史中各種文學變遷，應從文體風格來探究其相互差異。」見馮永敏：《劉師培及其文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頁220。

⁸⁷ 《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影印孫星衍重刊徐鉉本，1972年）釋「派」字云：「別水也。」（頁232）

義》第三、五課。第三課「附錄」的引言說：「漢魏之際文學變遷，既如上課所述矣。然其變遷之跡，非證以當時文章各體，不足以考其變遷之由。」⁸⁸其下輯錄禰衡等作者文章十二篇，各附按語，指陳文章風格。最後一條按語提出「魏文與漢不同者，蓋有四焉」，⁸⁹總結此十二篇文章所見的特色，與本課總述「建安文學，革易前型」的清峻、通脫、騁詞、華靡四點呼應。⁹⁰此外，總述雖然提到刑名縱橫等諸子流派，但與〈論文雜記〉作為分類的框架不同，劉氏的確試圖從歷史和社會的角度來說明這些思想體系在漢末復興，而影響及於文學風格，這與後來文學史家慣用的從社會到文學的論說方式一致，⁹¹難怪接受者眾。

綜合而言，「建安文學革易前型」說的變遷描述，除了放棄進化主義外，還有兩個異於早年的特點：（一）以文類為區隔；（二）重視變遷的過程。這兩個特點也可見於《講義》的其他部份，如第四課「魏晉文學之變遷」的總述，把太和到正始年間的文章分為兩派：一派承孔融、王粲而來，以傅嘏、王弼、何晏為代表，清峻簡約，文質兼備；另一派承阮瑀、陳琳而來，以嵇康、阮籍為代表，文章壯麗，摠采騁辭。兩派都闡發道家之理，但在風格上，前者與名、法家言為近，後者則與縱橫家為近。「阮、陳不善持論，孔、王雖善持論，而不能藻以玄思」，所以論者「昧厥遠源之所出」。⁹²這是文派的區分和流行。此課下文引《文心雕龍·明詩》篇「嵇志清峻，阮旨遙深」，劉氏的按語說：「嵇、阮之文，艷逸壯麗，大抵相同。……至其為詩，則為體迥異。」⁹³可見是分文類而論。⁹⁴又如第五課「宋齊梁陳文學概略」的「總論」一節，歸納其時文學得失為四點：（一）矜言數典，以富博為長；（二）梁代宮體，別為新變；（三）士崇講論，而語悉成章；（四）諧隱之文，斯時益甚。也是分文類而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劉師培指出東晉以來文學家多出於世族，以此解釋當時常有俱擅文名的父子兄弟，而且文學之成每於早歲，兼又文思敏捷等現象。該節之下又分「聲律說之發明」、「文筆之區別」兩題，以解答「當時文格所以上變晉、宋而下啟隋、

⁸⁸ 《遺書》，頁 2372。

⁸⁹ 即前文「《講義》與〈風度〉的分野」一節王瑤所引用者。

⁹⁰ 第三課「附錄」案語所列四點，除了包含清峻、通脫、騁詞、華靡四種風格特色，還有質直屏華一種。

⁹¹ 如羅根澤說：「文學是社會的一部門，社會變遷，文學也隨之變遷，以故必先了解中國社會史，才能進而了解中國文學史。」見羅根澤：〈研究中國文學史的計劃〉，載《羅根澤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 32。其實《文心雕龍·時序》篇也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范文瀾：《文心雕龍註》，頁 675）但古代論者意識到的社會因素，大抵只是君主右文、朝廷失道之類。

⁹² 《遺書》，頁 2377。

⁹³ 同上注，頁 2381。

⁹⁴ 劉氏區分文類有時範圍較寬，如此處詩文相對；有時範圍較狹，如「建安文學革易前型」說把文細分為書檄、論說、奏疏、詩賦四類。當然，不同文類可以有相同的特徵。

唐者」的原因。⁹⁵劉師培雖然採取他律論的立場，但從上述兩個例子可見，他一方面着力於社會和文風之間的關係分析，另一方面對促使文學變遷的外部因素作廣義的理解，不局限於政治。總體而言，劉氏此時變遷的圖像是不同文派的傳承、變異、分合，不侈言公例規則，而提供繁富的細節。然而，為甚麼敘述文學的變遷要以文類為界線，劉氏卻沒有交代理由，共時文類的關係也罕有探討，可見仍未脫出傳統辨體之學的影響。此書畢竟只是講義之體，引文遠比案語為多，劉氏心目中的文派變遷，尚未能充分描畫。

李帆指出，「1909年起，因思想、學術態度有所轉變，劉師培基本不再致力於學術上的中西交融，而是專意於中國古典學術的研究」，在《國粹學報》之後罕引西書。⁹⁶這可以部份地解釋《講義》為何放棄了進化主義，但更關鍵的影響當是「徵實之學」的研究進路，以及「搜集材料為主」的著述體式。劉氏〈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說，「惟斯事體大，必以蒐集材料為主」，文末又說，「此則徵實之學也」。《講義》以〈蒐文〉的原則廣輯文獻，劉氏的意見大部份散列於各條資料後的案語裏（小部份見於每課的總述中）。這種著作體式，使得劉氏凡有所言，都是和前代學者就特定話題來對話，而且設定話題的，是前人而非劉氏。因此前人紛繁的見解，劉氏都要一一直面，他可以同意或反對，但不能刪除或迴避。這種論說方式，最近的源頭自然是阮元。《講義》第二課〈文學辨體〉明言「此篇以阮氏〈文筆對〉為主，特所引群書，以類相從」，⁹⁷其精神可以上溯至清代盛世的乾嘉樸學。⁹⁸晚近學術界檢討進化的文學史觀，認為弊端在於簡化了複雜的文學現象。⁹⁹文學史研究未必可以完全「徵實」，但劉氏的方針有力地抗拒了簡化。

⁹⁵ 《遺書》，頁 2399–2401。

⁹⁶ 李帆《劉師培與中西學術》說：「在這一時期的著述中，徵引過西書的僅有〈論中國古代財政國有之弊〉一文，文中亦僅提到歐人 Laveleye 著《原始時代之財產》，並未闡發其說。」（頁 83）

⁹⁷ 《遺書》，頁 2365。〈文筆對〉即〈學海堂文筆策問〉，載阮元：《研經室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三集，卷五，頁 657–63。此文為阮元出題，其子阮福擬對。同樣引錄群書而加案語的，阮元還有〈論語論仁論〉、〈孟子論仁論〉、〈性命古訓〉等文，載《研經室集》，一集，卷八至十，頁 157–214。

⁹⁸ 梁啟超歸納「正統派」（即「樸學」）的學風為十點，第一點「凡立一義，必憑證據，無證據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擯」，第四點「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為不德」，第六點「凡採用舊說，必明引之，剿說認為大不德」，都與劉師培的徵實之學、廣輯文獻主張相通。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載《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 39。

⁹⁹ 如溫儒敏說：「進化的文學史觀強化了文學發展的歷史線索，論述文學現象往往用歸納法，大而化之，給人簡明快捷的結論，但也往往不能擺脫狹隘的線性思維的弊病，不能充份解釋複雜的文學歷史。」見溫儒敏：〈文學史觀的建構與對話——圍繞初期新文學的評價〉，載：《文學課堂：溫儒敏文學史論集》（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 375–76。

劉師培在北大同時講授中古文學史、漢魏六朝專家文和《文心雕龍》，後兩種有羅常培的筆記流傳。「文學史」隱含時間流逝的前提，變遷意味着不能回到歷史的上游，但從羅常培的聽課筆記看來，劉氏竟有和《講義》截然相反的論說。

《專家文》的〈緒論〉說：「要宜各就性之所近，專攻一家，『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汪容甫中為清代名家，而繹其所取法者，亦只《三國志》、《後漢書》、沈約、任昉四家而已。」¹⁰⁰研究文學為甚麼強調「性近」、「專攻」？因為該書的宗旨是學文，學文的目標是摹倣起來足以亂真：「今之研治漢魏六朝文學者，或尋源以竟流，或沿流而溯源，上下貫通，乃克參透一家之真相。真相既得，然後從而摹擬之，庶幾置諸本集中可以不辨真贋矣。」¹⁰¹通過溯源竟流來「參透一家之真相」，背後是文派變遷的觀念，但這裏把研究視作學習為文的手段。¹⁰²全書各篇都為這一宗旨服務，〈學文四忌〉、〈論謀篇之術〉等篇顧名思義，固不待言；〈史漢之句讀〉除了「句讀明而後意思可明」，更重要的是通過句讀來體會文章節奏：「蓋文章本有馳驟及頓挫兩種，《史》、《漢》中二者皆不廢。文章有頓挫而無馳驟，則失之弱；有馳驟而無頓挫，則失之滑。欲明其文中馳驟、頓挫之處，則非明其句讀不可。」¹⁰³學文的宗旨也貫徹到對文學風格和文類變化的態度。〈各家總論〉從司馬遷、班固說到沈約、庾信，雖然順時代而言，但各家並不代表其時代的文學特徵。劉氏儼然攤開一張文學風格分類表，介紹各家是為了提示學生選擇最適合個人效法的對象，如評論司馬遷、班固、范曄說：「三家之文，風格不同，而皆有獨到處。《史記》以空靈勝，《漢書》以詳實勝，《後漢書》以精雅勝。」又如說辨理之文，「與其法沈〔約〕，無寧宗嵇〔康〕」。¹⁰⁴前一條把相距五百多年的作者視為三種並存風格的代表，後一條並置兩個相距二百多年的作者來作選擇，時間差異的因素並不在考慮之中。

劉氏早年有〈南北文學不同論〉，從人類未有文字時南北語言不同說起，一直說到清代的駢散之爭，數千年來都是兩派對峙。¹⁰⁵《專家文》卻有一篇〈論研究文學不可為地理及時代之見所囿〉，提出「倘能於古人文字精勤鑽研，無論何人，均不難趨步，……然則，文學奚必有關地理哉？」此文又強調大作家不可企及之處，在於超越時代，「於當代因襲舊體之際，倘能不落窠臼，獨創新格；或於舉世革新之後，而能力挽狂瀾，篤守舊範者，必皆超軼流俗之士也」。¹⁰⁶前面說「不難趨步」，後面說「不

¹⁰⁰ 《補遺》，頁 1518。

¹⁰¹ 同上注，頁 1546。

¹⁰² 〈緒論〉把兩漢至唐初分為六期，第二期為魏代，「此期可專治建安七子之文，亦可專治王弼、何晏之文」。如果最終目標是研究文學史，怎能只讀一半？見《補遺》，頁 1516。

¹⁰³ 《補遺》，頁 1532。

¹⁰⁴ 同上注，頁 1518，1520。

¹⁰⁵ 《遺書》，頁 559-62；原刊《國粹學報》，第 1 年（1905 年）第 9 號（農曆九月二十日）。

¹⁰⁶ 《補遺》，頁 1544-45。

落窠臼」，兩者沒有矛盾。仿古和創新都是手段，崛起於當代才是目標，這也是從文學創作的角度看問題。

劉氏鼓勵學生選擇適合個人性格的文章來模擬，與《文心雕龍·體性》篇的「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相通。¹⁰⁷他又嚴格區分文類的正體和訛變，認為「文章既立各體之名，即各有其界說，各有其範圍。句法可以變化，而文體不能遷訛」，¹⁰⁸容許「在本體內之變化」，但不能「以他體作本體之文」，例如「敘記本以敘述事實為主，若加空論，即為失體」，¹⁰⁹這也同於《文心雕龍·通變》篇的「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¹¹⁰此外，兩書都是為了寫作而辨體。凡此種種，都可見《專家文》與傳統辨體之學呼吸相通。¹¹¹

有趣的是，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也有講授「作文之法」的部份，¹¹²戴燕認為「屬於文學研究領域的文學史，同實用寫作之間做如此清楚的劃分，在林傳甲的時代還不存在」，中國古人是認知和實踐齊頭並進的。¹¹³陳國球則認為，「『中國文學史』之題，只是〔林傳甲〕摭拾的觀念之一；林傳甲的主要目標是編『國文講義』多於撰寫『中國文學史』」。¹¹⁴在劉師培那裏，作文訣要只見於《專家文》和《文心雕龍》口義，《講義》並無「知行合一」的意味，與後世的「文學史」完全一致。

陳平原提到，「1918年北大發佈的〈文科國文學門文學教授案〉，其中明確規定：『文科國文學門設有文學史及文學兩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

¹⁰⁷ 范文瀾：《文心雕龍註》，頁506。

¹⁰⁸ 《補遺》，頁1541。本篇題目為〈文章變化與文體遷訛〉。

¹⁰⁹ 《補遺》，頁1540-41。

¹¹⁰ 〈通變〉篇接着解釋：「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聘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范文瀾：《文心雕龍註》，頁519）劉氏與《文心雕龍》在篤守文類界限的原則上一致，但具體尺度有出入，例子可見《文心雕龍頌讚篇》「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巡〉，變為序引」句、「汪洋以樹義」句口義，見《補遺》，頁1555、1556。

¹¹¹ 〈緒論〉云：「文章之體既明，然後各就性之所近，先決定所欲研究之文體，次擇定擅長此體之專家，取法得宜，進益必速，故不可不慎也。」《文心雕龍誄碑篇口義》選錄《文選》誄、碑之文多篇評講作法，舉凡佈局、章法、造句、繁省皆有詳解。見《補遺》，頁1561-83。鄧仕樑認為《文心雕龍》也是教人寫文章的書，見鄧仕樑：〈「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文心雕龍·風骨》九慮〉，《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2期（1998年3月），頁128。

¹¹² 該篇名為〈古經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為作文之法〉，下分十八章，載林傳甲、朱希祖、吳梅（著）、陳平原（輯）：《早期北大文學史講義三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93-105。

¹¹³ 戴燕：《文學史的權力》，頁175。

¹¹⁴ 陳國球：〈「錯體」文學史——林甲的「京師大學堂國文講義」〉，載《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頁59。

區別。』前者的目的是『使學者知各代文學之變遷及其派別』，後者的功用則為『使學者研尋作文之妙用，有以窺見作者之用心，俾增進其文學之技術』。1919年10月的「國文教授會」甚至議決「教員會分五種」，文學史教員會、文學教員會為其中兩種。陳氏又認為，「新文化運動以前，雖無明確分工，可林傳甲與姚永樸〔《文學研究法》〕二書的巨大差異，同樣蘊涵着『史的傳授』與『文的練習』兩種截然不同的課程設想」。¹¹⁵1917年劉師培在北大開課的第一個學期，上述提案還未公佈，但當時中國文學門的「本科現行課程」已呈明顯的二分法，每一年級都有文學和文學史科。劉師培任教一、二年級的「中國文學」和二年級的「中國古代文學史」，為了顯出分別，刻意在講授兩種科目時採取不同的立場，並非不能理解的事。「中國文學史」是現代大學教育制度下的產物，¹¹⁶本節的分析旨在通過《專家文》、《文心雕龍》口義的對照，指出劉氏其實還有另一種與傳統相通的對待漢魏六朝文學方式，《講義》的現代意味就在這種對照中顯現出來。

總 結

綜合以上所論，本文認為劉師培早年受進化論影響，主張文學變遷有一個固定的方向，即「由深趨淺，由簡入繁」，但此一宏觀論斷不僅在解釋史實時有困難，更嚴重的是與他從阮元繼承過來的推尊駢文立場常生矛盾。劉氏後期在《講義》裏完全放棄了單一路線的文學演進圖式，改為分類論列，並關注變遷的過程，但在同一時期的《專家文》裏，他又示範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漢魏六朝文學研究方向。對照兩書，可以看到文學史學科規範在近世的浮現。

把「文學」當作一個整體的概念來把握，嘗試歸納各種文類共同表現的時代特徵，使得魯迅以降的學者對「建安文學革易前型」的理解，與劉師培貌同心異。尋找「時代特徵」的文學史研究，最大的危機是簡化歷史，把不符合特徵的作者和作品掃出視野之外。以「通悅」為例，不少論者認為這是建安或魏晉時代的一大特徵。最早提出「通悅」的是劉師培，他當然也談論「時代特徵」，但以文類為區隔，減少了「整體化」的風險。不過這沒有徹底解決問題，他只是沿襲傳統文論的辨體觀念，縮小了體現特徵的範圍，卻沒有解釋為何以文類為界線。

劉氏早年立論大開大闢，固然氣魄雄奇，但像「由文趨質」這樣的概括，難免削材料之足適論點之履。《講義》着力於豐富的細節，把大敘述懸擱起來，反而展示了眾多深刻的見解。「徵實」是清代樸學家的治學原則，《講義》體現了這種精神，但並非單純的復古。

¹¹⁵ 陳平原：《早期北大文學史講義三種·序》，頁2。

¹¹⁶ 這一點論者已多，可參陳平原：〈「文學史」作為一門學科的建立〉，載陳平原：《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3-6。

Changes in Liu Shipei's Concept of Literary History

(A Summary)

Fan Sin Piu

Lu Xun highly recommended Liu Shipei's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 especially his analysis of the innovation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Jian'an period. The *History* represents Liu's academic thoughts during the last few years of his life. However, one should be careful not to appraise Liu's arguments solely on the basis of Lu Xun's presentation, as their concepts of literary history differed in a significant way. Another notable difference occurred between the thoughts of the early and later stages of Liu's life. In the early stage, Liu was heavily influenced by Darwinism. He proposed a linear progression of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History*, Liu abolished the model and showed remarkable insights in describing the changes of various genres with great details.

關鍵詞：劉師培 《中古文學史講義》 建安文學 文學史觀念

Keywords: Liu Shipei,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 literature of the Jian'an period, concept of literary history